

## 中国“坝”占全球

Peter Bosshard

2002年7月14日那天，我差点被人从Naminya村赶了出来。由于乌干达的Bujagali水坝而被迫迁徙的几百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在了这里。村子坐落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旁边的一座贫瘠的小山上，遥望着尼罗河（the Nile）。村民们误认为我是水坝开发方AES尼罗河电力公司（AES Nile Power）的一名经理。这家公司和村民们有不少没有算清的旧账。村民们获得的新土地远不及他们交出去的那般富饶，修建水坝使得这些村民不但不能在尼罗河里面捕鱼，而且还要步行数英里去寻找柴火或是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不巧的是，我和这个项目经理的名字一样。在了解到这不过是个巧合之后，村民们的口气才缓和了起来，紧攥的拳头也松开了。“我们常常饿着肚子睡觉”，当误解澄清后，一名村民这样跟我说道。

我拜访过后没过几周，Bujagali水坝工程就因为腐败丑闻而搁浅了。工程建设的主要承包方，挪威Veidekke集团公司（Veidekke Group）承认其曾贿赂乌干达前能源部长。这位前能源部长同时还列席世界银行的董事会。世行于是冻结了其提供对Bujagali水坝的资金。私人开发商也退出了，接下来的几年工程就被搁置在了那里。政府一直坚持说水坝仍要修建；另一方面，被迫迁徙的村民们面对种种问题，却不得不自己去寻求解决办法。

水电水坝为世界提供了五分之一的电力。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低碳电力源更是尤其受欢迎。然而在我访问Naminya村的时候，水坝建设却像是个夕阳产业。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长江，在印度的Narmada山谷，在小亚细亚（Anatolia）的东南部，还有湄公河流域，因大坝而起的纠纷让政府和金融机构都苦不堪言。独立机构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调查发现，大多数水坝不但在多项指标上没能达到期望值，比如发电量、灌溉能力和洪水控制能力，而且还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有4000万到8000万人口因水坝而被迫迁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这个过程中被赤贫化。这个行业的一些领头企业，比如ABB和Sulzer，都选择了撤出。世界银行也大幅减少了其对水坝项目的贷款。“大坝占我们业绩的10%，但同时也是95%的麻烦制造者”，世界银行资深水利顾问John Briscoe在2003年曾这样说道。

苏丹北部的Merowe水坝的经历清楚的阐明了水坝行业命运的变革。从70年代开始，一撮西方工程公司就打算在尼罗河的第四瀑布上修建水电站。到了90年代，苏丹政府的代表走访了加拿大，马来西亚，欧洲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资金援助，却几乎无功而返。阿拉伯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些财政支持，但对于水坝所需要的技术却无能为力。欧洲的出口信用机构则指出，该工程缺乏相应的环境影响检测（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数以万计的农民将被迫从富饶的尼罗河谷迁徙至沙漠中的不毛之地；而苏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人权保障记录丝毫没法给人以任何信心。举例而言，法国政府就曾因为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拒绝为工程中的一份合同提供资金。

到了新世纪的初期，Merowe水坝工程似乎已经胎死腹中。在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也多令资金供应方头疼不已。然而就在这时，在世界水坝业中出现了如同地震般的巨变，震中就在中国。

### 扭转乾坤

今天，几乎世界上的一半的大型水坝都在中国。拥有超过17万兆瓦的发电能力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电发电国。自从1909年西门子公司（Siemens）在清朝统治下的云南省的一条河流上安装了第一台水电涡轮机以来，西方公司已经为在中国的水电水坝提供了技术支持。当中国政府在90年代初决定修建巨大的三峡水坝和二滩水坝时，它依然需要依赖西方设备供应商。但是这一次，它为游戏制定了新的规则。有意在数十亿美元的合作中分一杯羹的公司必须和中方伙伴合作，且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半数的涡轮和发电机。其时水电业的领军公司，包括ABB、Alstom、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西门子（Siemens）都严格履行了这些规定。他们同中国的供应商合资经营，并在这一过程中转让了他们的技术。

同许多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一样，中国“学生”以极快的步伐模仿、低价竞争然后超越了他们的西方“老师”。中国的制造厂商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家经过数

十年装配小型水坝积累了国际经验。在大约 2003 年的时候，他们进入了大型水电项目的专卖市场。位于领头羊位置的是三家通过二滩工程和三峡工程获得了最先进的西方技术的公司：首先是东方电机有限公司（Dongfang Electrical Machinery）和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Harbin Power Equipment），这是两家来自中国高度工业化的东北部的、四处扩张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其次是总部设于北京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Sinohydro），中国最为领先的水电开发商。他们的手段现如今已经被人所熟知：中国的公司大量运用规模经济，并且通过简化生产流程使得西方的科技符合贫穷国家的需求，同时又确保价格非常低廉。简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里，中国的水坝建设者开始在西方国家的主场频频击败它的对手。

中国的水电公司进军国外市场完全出于自主的选择。国内市场里的利润率低得让人心寒，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也处处受限。一旦得到了最先进的水电技术，这些公司急切的想在更加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上争夺生意。中国水坝建设者的海外扩张，同世纪之交政府所开始推行的“走出去”的经济战略相吻合。在中国，全世界可耕作土地的百分之七养活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一座“世界工厂”；它需要大量的资源来为全球的中产阶级生产服装，以及塞满他们客厅的电视机和沙发。中国的石油、木材和矿物资源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国内的高速发展和它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因此，中国转而利用对外贸易和投资来获取其国内所欠缺的资源。全球经济扩张还帮助中国躲避了因国家农业现代化而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失业危机。由于农业现代化，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前往城镇中心寻找工作。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例如同非洲的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近 20 倍。

尽管中国水电产业的全球化并非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北京政府对此一直积极表示支持。海外水坝项目为中国东北部的衰落地带创造了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在缅甸、刚果（金）、加蓬和赞比亚，它们还为更大规模的资源索取项目提供了能源基础设施；这同时也迎合了中国的战略利益。最后一点是，正如早些年北京政府在世界各地修建体育馆以体现友好姿态一样，水坝已经成为中国同发展中世界间蓬勃发展的经济合作的最为鲜明的象征。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对于有危险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变得越发怯懦。

出口信用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在中国政府支持其基础设施类公司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家银行专门负责国有企业的大型项目。为了推进海外水坝的建设，该行往往以低利率慷慨的提供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是 1994 年才成立起来的，比起它的西方竞争者要晚了 60 多年，然而它的业绩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出口信用机构，包括世界银行。2003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向苏丹的 Merowe 项目提供 5.19 亿美元的贷款。这为这座尼罗河第四瀑布上的水坝带来了重大突破。

## 地面直击

当我和我的同事于 2005 年 2 月份访问苏丹的时候，Omar al-Bashir 总统宣称 Merowe 水坝象征着苏丹贫困问题的终结。该水电项目将令全国的发电量翻一倍还多；工业，城镇消费者和农业都将因此而受益。水坝管理方的代表承认，因工程而造成的长达 174 公里的水库将最终迫使超过 5 万人从尼罗河河谷搬离。但是他们表示，难民安置地将会配备各种现代化设施，学校、健康中心和灌溉水源都一应俱全。

但是当我们在 El Multaga 难民安置地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和农民们坐下来喝茶闲谈时，听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一位村中的长者，出于保护他的需要我们称他为 Osman，为我们概述了那里的情况。他们新家的土地非常的贫瘠，每英亩只能产出两到三袋小麦；而在尼罗河岸边的旧村庄那里的土地上，每英亩能有 15 到 20 袋的产量。更糟糕的是，在贫瘠的土壤耕作和播种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许多家庭因此把男孩子从学校里面叫了回来到田地里去帮忙。在 El Multaga 农民们指给我们看的土地中，有几处已经被沙子所覆盖。“我们被骗了”，Osman 和他的同胞们抱怨道。

妇女们带着她们的故事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在尼罗河河谷的老家那里，她们种植豆子、鹰嘴豆、绿色蔬菜、西红柿、洋葱、孜然芹、茄子和海枣，或者拿回家里用，或者拿到市场上出售。现如今，贫瘠的土壤养活不起菜园了。不但妇女们失去了收入的来源，家里的营养供给也变得单一。从 2003 年末约 5000 人搬迁到此地开始，贫穷在 El Multaga 迅速的蔓延。无数家庭第一次依赖起救济品过日子；很多人选择了离开这个令人厌恶的新家，转而投奔 Khartoum 的贫民窟。

穿着白色长袍的高个子农民们和五颜六色服装的妇女们的命运无疑遭到了侵犯。“从有史

可考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居住在尼罗河河谷，在这里享受安宁和繁荣的生活”，Osman 这样告诉我们，“这么久以来，政府未曾为我们做过半点事情。凭什么它要引进发展而我们就要被欺骗呢？”

居住在尼罗河河谷更上游地带、将会晚些被迁徙的农民们，在看到他们在 El Multaga 同胞们的遭遇后，坚决反对将他们迁离自己的土地。他们希望能在未来的狭长水库的沿岸住下来——那里更接近他们祖先的土地——而不是政府指派给他们的位于努比亚沙漠（Nubian Desert）里的不毛之地。“如果这个工程真的造福于国家，那么政府应当保障我们获得正当赔偿和选择安置地的权利”，一位来自 Manasir 族社区的长者这样跟我们说。但是苏丹政府却什么也没给。警察和暴徒不止一次的冲击村民的会议，拘禁村庄领导人，还向抗议者开枪射击。2006 年 4 月，水坝执行单位的民兵组织——一个直接向总统负责的部长级单位——向一群聚集的村民发动了攻击。这些村民当时正聚集在 El Multaga 以西的 Amri 村的一座学校里。3 名农民遭到杀害，50 多人受了伤。一位 Osman 在 El Multaga 的同伴在另一次事件中被射中了胳膊。“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是大坝管理方对待我们就像是对待敌人”，他非常痛心的告诉我们。

## 出口中国经验

2006 年 12 月，我应邀同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探讨大型水坝存在的问题。这位见多识广而又平易近人的官员告诉我，他确实听说了苏丹 Merowe 水坝的问题。他还向我保证，像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是会为他们接手项目的社会及环境影响负责的。他许诺将会派遣一队工作人员前往苏丹进行调查。但是这位出口信用机构的首脑告诉我说，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摆脱贫困，其次才有可能去关心环境，而且中国绝不会阻挠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李的意思似乎就是说，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资助海外项目不过是在出口它自己的经验罢了。

伴随着尼罗河第四瀑布上的 Merowe 水坝一天天成型，中国的水坝建设者飞速的在世界各处扩张他们的生意。在缅甸、柬埔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加纳、老挝、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和赞比亚，他们迅速的、一个接一个的完成可行性研究并签订项目合同。今天，中国的公司和金融家们至少涉足世界上 50 个国家共 220 座水坝项目。他们在建造世界上 24 座最大的水电站中的 19 座。此外，发电设备是当下中国第二大出口收入来源，仅次于电子产品。

目睹了中国水坝建设者们在全球市场上所取得的成功，十年前才将他们的技术转移给中国的西方竞争者们怨言颇多。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后一个被我们吊死的资本家就是卖给我们绳子的那一位”。这句话的现代版本是：最后一个溺死在水库里的西方造坝者恰恰就是卖给中国涡轮机的那一位。

2009 年 3 月，al-Bashir 总统为 Merowe 水坝举行了庄重而盛大的竣工典礼。尽管他赞扬这项工程是“苏丹发展过程中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解。当水坝大门关闭，上游水库开始蓄水后，那些拒绝离开家园的人们只得像老鼠般四散而逃。成千上万的曾决心留守他们已被洪水淹没的土地的家庭，如今只得在水库岸边的临时避难所里面竭尽全力维持他们惨淡的生计。

那些被迁移至 El Multaga 的人们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农业部的一支调查队在四月和五月两次走访了安置地，他们的汇报指出那里的生活境况正在“毁灭性的恶化”。由于土壤遭侵蚀，又缺少水和燃料，农民收获不到粮食。许多家庭逃离了努比亚沙漠中的安置地，希望在其他地方再寻新家。

Merowe 水坝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全部水电项目。电力可以创造制造业类工作岗位，为水供应系统供能，以及为健康中心和千家万户供电。在加拿大、挪威、南非还有许多国家，水坝既保障了难民的权利，也保护了环境；它们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尼罗河上的水坝也并不是个案。对于水坝集资的新一轮的放宽要求导致许多没能达到国际社会及环境标准的水坝得以推进。而中国要为这些问题水坝的很大一部分负责。

7 月的时候，一家中国水坝建设单位签署了一份表明理解埃塞俄比亚政府在 Omo 河上修建 Gibe 四号水坝的备忘录。Omo 河的下游是 20 万名贫穷农民的生计之源。每年洪水过后，这些人就在河岸边耕作。还有另外 30 万居住在肯尼亚北部 Turkana 湖沿岸的人也靠这条河养

活，这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湖。而 Omo 河上的 Gibe 四号水坝和其他水坝将会严重阻断每年的洪水以及通往 Turkana 湖的水供应。在这一地区工作的科学家们担心，这些水坝将会把 Omo 下游河谷和 Turkana 湖的脆弱的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水坝建设者还在为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湄公河上的主要水坝做可行性研究。湄公河上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内陆渔业，它在中国国境线以南的部分还没有建起任何水坝。鱼类是这个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六千万人口的重要食物来源。在湄公河上建坝，不但会阻断鱼类的迁徙，损害富饶的冲积平原上的农业，还会摧毁无价珍贵的生态体系。

在缅甸，中国的投资者和设备提供商参与了超过 20 座大型水电项目。它们之中的很多都位于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偏远地区。当地政府不向大型水坝索要环境影响评估，也全然不顾受水坝影响的那些社区的人权。根据民间组织的档案记录，缅甸的水坝往往是在军队镇压下由强迫劳力修建完成的。

伴随着水坝产业走向成熟，中国已然成为了主角；但是在国际水电领域，竞争者正相继出现。来自多个国家的公司也离开了他们的国内市场，前来参与水电的全球扩张。印度公司正在尼泊尔、不丹、缅甸和越南建坝。巴西公司则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做着同样的买卖。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公司已经盘算着在湄公河流域大兴土木。俄国、伊朗和韩国的供应商也纷纷加入了全球水电俱乐部。与中国的投资商们类似，在他们的项目中，他们并不总是遵守国际所认可的社会及环境标准。但是扮演领头羊的是中国的公司和金融家，因而他们不得不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谴责。如果不是他们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在缅甸、老挝和苏丹这些国家的很多工程根本无法推进。

## 同病相怜

2008 年 10 月，中国提前于计划完成了三峡水坝的建设任务。每年水坝的发电量相当于燃烧 3 千万吨煤；此外政府还希望水坝可以保护下游人口免受长江肆虐的洪水的侵袭。中国的水电行业把三峡工程视作巨大的成功，正在为其尽情的欢呼。近年来，刚果、尼泊尔、巴基斯坦、南非和其他国家的高层次代表纷纷应邀前来访问三峡水坝。它已经成为了一座展示中国工程实力的舞台。

然而云阳市的居民们丝毫体味不到喜悦的气氛；这座曾经有着 7 万 4 千人口的城市已经被水淹没，新城重建在水库的高岸之上。当三峡工程最初启动的时候，政府向将要为工程让路的人们做出许诺，它将为农民提供土地，为城市人口创造工作岗位。然而历经十年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关心创造就业的问题了。云阳市曾经的 181 家工厂只有 45 家被迁移到了高地；而这些重新安置后的工厂中有 20 家已经关闭。地方官员把赔偿金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剩下的钱已不足以为移民们支付新家的费用。结果，许多家庭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积蓄去购买新的公寓，同时还要面对一旦丢失工作后的惨淡未来。三峡大坝并没有惠及云阳的人们。

环境专家们同样有理由表示担心。将原本生机勃勃的长江变成一处停滞的水体的后果是鱼类数目减少，而有毒藻类过度繁殖的情况却变得频繁起来；水生生物因此受到影响，水源本身也变得不再适宜饮用。出于发电和防洪的需要，水坝自身的运行会造成每年水库水位约 100 英尺的上下浮动。这种浮动令山坡变得不稳定，并且已经导致了数百起的塌方事故。今年早些时候，约有超过 100 英里的水库堤岸面临坍塌的危险。“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长江论坛（Yangtze River Forum）的秘书长在 2007 年 8 月份的时候如此说道。

纵观全国，以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对公共健康正在构成巨大的威胁。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中国每年因水源和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早产儿死亡约有 75 万起。政府很清楚国家的人口正在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承受巨大的代价；它已经在努力清理河流，削减碳排放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官员一方面容许了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只要抗议行为控制在底限之内），另一反面也强化了环保法规，并且于 2008 年设立了环境保护部。该部曾屡次成功阻止制造污染的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或是在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如此大的权力，任何西方环保部都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同时还是生产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领先者，从而引导着未来的能源市场。

从云阳到北京，决策者在哪儿都躲不过大型水坝带来的头疼。当前政府比起它的前任似

乎不那么热心于修建水坝。无论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总理温家宝都没有前去参加三峡水坝的竣工典礼。温家宝总理曾经几次亲自干涉并要求终止在云南省怒江上修建的具破坏性的水电项目。就国内而言，中国已经变的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了，但是这种转变有可能在近期也影响其在海外的建坝行为吗？

## 警铃响起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活动是复杂多面的。一方面，中国公司修建了当地所急需的医院、铁路和公路。然而在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矿产资源和砍伐森林方面，他们也使用了无情的手段。中国公司曾被视为不同于西方一心想要剥削的投资者而受到欢迎；然而不出几年时间，中国的采矿、伐木和建筑公司在许多国家纷纷遭到强烈抵制。例如在赞比亚，2006年的一起在中国爆破物工厂发生的事故导致了几名当地工人的死亡，暴乱由此引发，进而导致了更多的员工遭杀害。中国公司应扮演何种角色甚至在赞比亚总统选举中成为了热点话题。当胡锦涛主席于2007年2月份访问赞比亚的时候，接待他的主人建议他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前往该国的采铜地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中国油料设施及工厂遭到了抗议者和激进分子的攻击，惹恼他们的是有关一长串问题的积怨：不对当地人开放工作岗位，缺少给当地的合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扶植地方豪霸。在2007年6月，针对苏丹将要修建的Kajbar水坝，受其影响的村民们表达了愤怒的抗议；这是中国公司打算在Merowe水坝下游修建的另一座水坝。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四名抗议者遭到了政府民兵的杀害。在博茨瓦纳、加纳、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水坝项目还卷入了劳工及社区纠纷之中。

在赞比亚和其他地区的针对中国公司的敌意令中国政府十分震惊。自2006年起，政府相关单位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和改进中国海外项目的工作环境，环保措施及社区关系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号召中国投资者“保护当地雇佣人员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关注环境资源的保护，关照和支持地方社区，以及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与声誉”。当胡主席于2007年早期访问非洲时，每经过一个国家，他都告诫中国企业要尊重地方法律。目前北京的环境保护和商业部门正在起草指导方针，要求投资者当对方国家的环保标准不够健全时，依据中国国内的环境法律运作其海外项目。

然而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的，山高皇帝远。处于偏远省份的地方官员和商人并不总是听从来自北京的指令；而当他们来到缅甸、赞比亚或是塞拉利昂进行投资时，就更无法无天了。尽管企业自身归国家所有，中国企业在经营时总是同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非一定遵守政府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同他们的企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

但是国际上的民间社团已经开始在中国和在东道国里面扮演起这些公司的牵制力量的角色。他们越发熟练的监视着中国海外投资者的所作所为，正如数年来他们监视西方的企业一样。自胡主席于2007年访问以来，已经有多个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前往非洲去了解中国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聆听非洲同胞们所关心的问题。2007年5月，一位苏丹的活动家来到北京向媒体披露了Merowe水坝所存在的问题。由于他的勇敢行为，中国外交部被迫向公众表示，政府已在“高度重视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且将针对像Merowe水坝这样的工程采取“严格的环境评估标准”。在2008年春季，中国进出口银行冻结了一项原本提供给加蓬的Belinga水坝的贷款，因为一个当地环保组织提醒它说这座水坝将在公共环境影响评估缺失的情况下修建于一座国家公园里面。

## 同归于尽式的环保竞赛？

当他们的中国竞争者征服世界市场时，西方的水坝建设商和金融家们并没有做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他们又一次叫嚷了起来，四处散布对中国再次称霸水电领域的担忧。如果大型水坝建设已经让世界银行头疼不已，他们声称，那么由中国出资和负责修建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世行已经抛开早先的谨慎态度，重新开始接纳水坝了。自2003年以来，它已经批准了近40亿美元的款项，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扶持中型水电项目。即便今天西方投资人不再涉足那些具破坏性的项目，西方和中国水坝建设商之间的竞争依然可能进一步在整体上威胁环境标准。

对于一些备受争议的项目，比如老挝的湄公河支流上的Nam Theun 2号水坝和土耳其的底格里斯河上的Ilisu水坝，欧洲水坝建设商和金融家在抵制严厉的社会及环境指标时要起了中国牌。他们坚持称，如果西方制度在标准的采纳方面过于严格的话，中国的竞争者就会抢走他们的生意，而中国人对于这类项目的环境影响更加不关心。“中国的银行才不管什么社会

或者人权状况”，欧洲投资银行的主席在 2006 年 11 月的发言中这样说道，并指出他的银行需要“考虑我们希望强加给对方何种程度的标准”。

2007 年 4 月，在我访问此地 5 年后，世界银行向乌干达的 Bujagali 水坝批准了 3 亿 6 千万美元的扶持款项；这个项目本在 2002 年已被该国放弃了。根据新的条款，Naminya 安置地获得了一座卫生站和一所幼儿园。然而村民们仍然抱怨说，由于失去了同尼罗河和附近的市场的联系，他们比起迁徙前要更贫穷。不用多久，工程开发商还会将更多的人迁至 Naminya，好为水坝的输电线路腾出空间。如果我们因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水坝建设者而降低了社会及环境标准，那么结果往往是这种情况：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中的这些赤贫化的、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通过降低社会及环境标准来竞争合同只会导致更多的像 Merowe 和三峡水坝那样的浪费和无用功。近来的经验表明，尽管中国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在社会及环境价值观方面双方是有着共同所关心的话题的。世界各国政府已签署了一系列公认的国际环境协议。尽管就如何履行他们的义务这一问题各方依然争执不休，但是在各国国民和不断壮大的国际公民社会网络的压力下，大家都愈发主动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比起参加一场同归于尽式的环保竞赛，同北京以及东道主政府合作、在国际项目上强化环境保护标准应当是更有前景的一个选择。